



广东文物 普查成果图录

(出土文物部分)

☐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编
☐ 广东省博物馆



编辑说明

本书选入广东省文物普查期间出土的古代文物162件(组)。其中绝大部分是从1984年10月全省各地选送《广东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的文物中挑选的。其后又陆续补充了一些。因条件所限,各地还有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未能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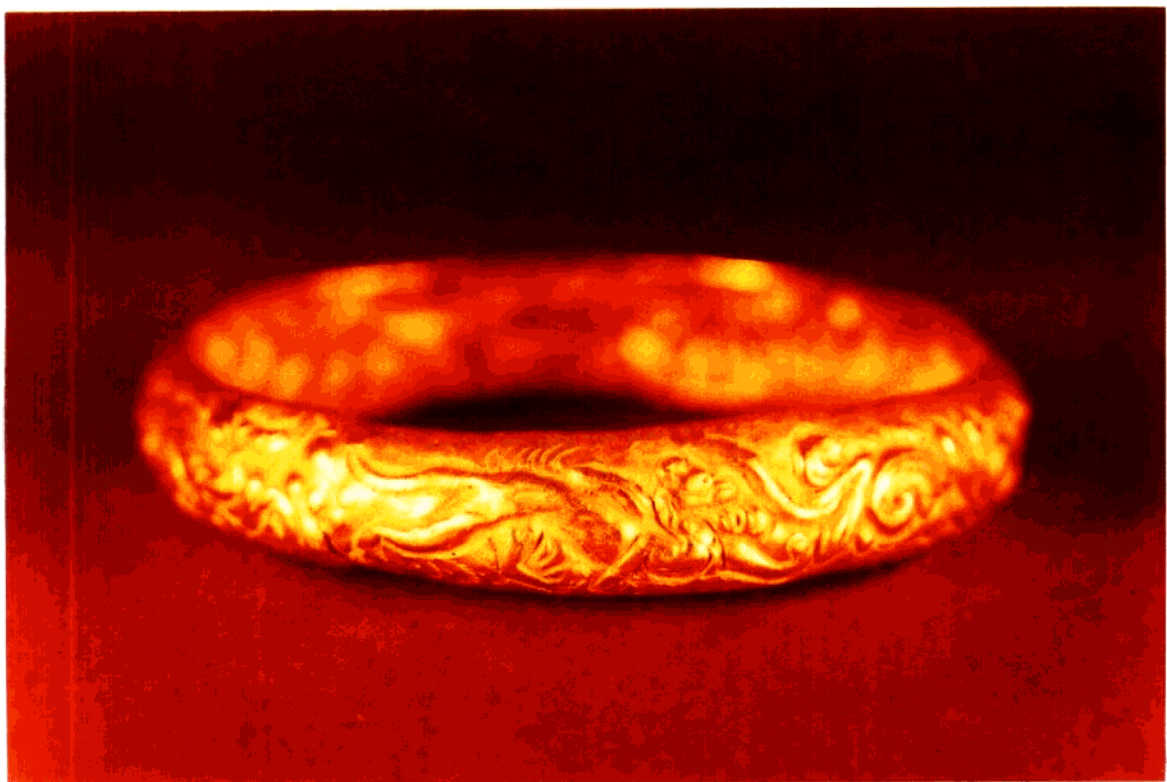
43. 铜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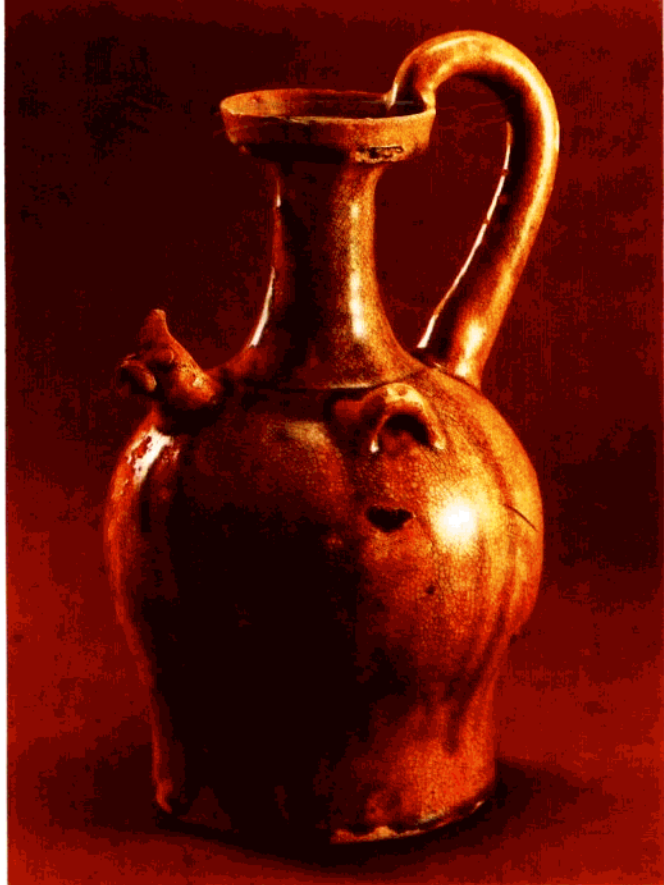
60. 铜鉴



97. 青铜朱雀玄武



121. 金手鐲



141. 青瓷鸡首壶

145. 褐彩瓷枕





148. 褐彩瓷罐

151. 褐彩瓷罐



152. 褐彩瓶

前 言

祖国文物是我们先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遗存，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广东地处祖国南疆，山川秀丽，海岸曲折，历史悠久，地上、地下和水中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富。为了使蕴藏在境内的各类文物得到保护，便于进行深入科学研究，更好地发挥文物资源在新时期开放、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9号文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府〔1981〕190号文的要求，我省从1982年起，全面展开了文物普查工作。

文物普查是一项范围广泛、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除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外，还要有一批既有专业知识，又能吃苦耐劳的普查队伍。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省、地、市、县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织了3395人参加的文物普查队伍，举办了不同类型的文物知识展览，编印了各种宣传文件、讲稿和资料，及时出版了各级文物普查简报和通讯，投入了数百万元的经费。为提高领导和文物普查队伍的政策水平和专业水平，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省、地(市)和部分县，多次举办了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古建筑知识、测绘制图和文物鉴定等训练班，请有关专家、学者和领导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东历史、考古和民族、民俗、华侨文物基础知识，传授文物调查和考古技术，培养了大量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为我省文物普查工作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物普查工作的艰苦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工作在第一线的普查队员们，在烈日的烘烤下，在寒风暴雨中，背负行李、工具和资料，寄居农舍，饥餐荒野，忍受着蚊虫的叮咬，毒蛇的侵袭，走村串户，翻山越岭，跨河渡水，深入险洞，认真地宣传文物政策法规，细致地调查文物古迹，探寻地下遗存，详尽地测绘记录和精心地采集标本，为按时保质完成全省的文物普查任务，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宝贵贡献。1985年，文化部文物局和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普查工作中的先进市、县和模范人物，给予了表彰和奖励。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劳动，文物普查结出了累累硕果。根据各市、地上报的数字统计，全省共征集历史文物57697件、革命文物6113件；重新登记和发现古遗址2842处、古墓葬2804处、古建筑7195处、革命遗址1211处、民族、民俗、华侨等其他文物点、外国人在华文物、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证点等2918处。

文物普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主要应通过编写文物志、文物分布地图集来反映，就其重要成果和文物精华介绍来说，主要应通过科学研究论著和文物图录来反映。这本图录是在全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的基础上编辑的，虽不能全面反映普查的成果，但可以小见大，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分科学调查征集的宝贵实物资料。睹物思人念事，值此普查文物图录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支持这次文物大普查工作的领导和为文物普查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文博工作者、普查队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恒彬

一九八九年春节

目 录

前言.....	徐恒彬(1)
考古新发现和重要收获.....	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2)
图版与说明.....	(11)

图 版 目 次

1. 砍砸器	25. 石戈	49. 陶瓮
2. 砍砸器	26. 石戈	50. 陶豆
3. 石镞	27. 石戈	51—57. 铜甬钟
4. 穿孔石铲	28. 石戈	58. 铜鼎
5. 双肩石铤	29. 石戈	59. 铜鉴
6. 石斧	30. 石戈	60. 铜鉴
7. 石镞	31. 石矛	61. 铜叉
8. 大石铲	32. 凹刃石铤	62. 铜镰
9. 大石铲	33. 石矛	63. 铜钺
10. 夹砂圈底钵	34. 陶尊	64. 铜戈
11. 圈底釜	35. 陶罐	65. 铜矛
12. 圈底釜	36. 陶壶	66. 铜矛
13. 陶罐	37. 陶壶	67. 铜人首柱形器
14. 陶罐	38. 陶壶	68. 铜剑
15. 双耳陶罐	39. 有流带把陶壶	69. 铜斧
16. 环形陶壶	40. 凹底陶罐	70. 铜斧
17. 陶罐	41. 陶豆	71. 玉珖
18. 陶鸡形壶	42. 陶壶	72—77. 铜甬钟
19. 陶支脚	43. 铜铙	78. 陶罐
20. 贝壳装饰品	44. 铜铙	79. 双耳陶罐
21. 石臂环	45. 铜戈	80. 双耳陶罐
22. 石琮	46. 铜铤	81. 陶簋
23. 石琮	47. 夔纹陶罐	82. 陶瓮
24. 玉琮	48. 陶罐	83. 陶瓮

84. 瓦当
85. 瓦当
86. 陶后
87. 陶豆
88. 双耳陶罐
89. 熏炉
90. 陶俑
91. 陶兽俑
92. 陶牛圈(模型器)
93. 铁削
94. 青铜三足盆
95. 铜三足釜
96. 铜三足釜
97. 青铜朱雀玄武
98. 铜洗
99. 铜豆
100. 铜斧
101. 铜碗
102. 四耳陶罐
103. 陶温壶
104. 铜镜
105. 陶犁田耙田模型
106. 青瓷鸡首壶
107. 青瓷羊尊
108. 三足石砚
109. 变形四叶鸾凤兽纹镜
110. 水波纹大陶瓮
111. 波斯银币
112. 鎏金铜盅
113. 银镯
114. 青瓷鸡首壶
115. 青瓷豆
116. 青瓷鱼纹碟
117. 青瓷莲瓣纹碗
118. 青瓷莲花纹洗
119. 青瓷四耳罐
120. 青瓷六耳罐
121. 金手镯
122. 青瓷砚
123. 青瓷灶
124. 青瓷双耳罐
125. 青瓷壶
126. 青铜托盏
127. 铜熨斗
128. 方形素面铜镜
129. 八弧宝相花铜镜
130. 铜佛像
131. 铜勺、铜筷
132. “乾亨重宝”钱范
133. 瓷壶
134. 长方形抄手砚
135. 陶坛
136. 陶坛
137. 陶多角罐
138. 陶多角罐
139. 青白瓷坛
140. 青瓷权
141. 瓦当、滴水
142. 瓦当、筒瓦
143. 褐彩瓷枕
144. 褐彩瓷枕
145. 褐彩瓷枕
146. 褐彩瓷瓶
147. 褐彩瓷罐
148. 褐彩瓷罐
149. 褐彩瓷罐
150. 褐彩瓷罐
151. 褐彩瓷罐
152. 褐彩瓶
153. 铜权
154. 花口瓷瓶
155. 青花瓷罐
156. 铜印
157. 青瓷碗
158. 青瓷盘
159. 玉镯
160. 铜印
161. 总兵官印
162. 铁盔

前 言

祖国文物是我们先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遗存，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广东地处祖国南疆，山川秀丽，海岸曲折，历史悠久，地上、地下和水中的文物资源十分丰富。为了使蕴藏在境内的各类文物得到保护，便于进行深入科学研究，更好地发挥文物资源在新时期开放、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9号文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府〔1981〕190号文的要求，我省从1982年起，全面展开了文物普查工作。

文物普查是一项范围广泛、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除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外，还要有一批既有专业知识，又能吃苦耐劳的普查队伍。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省、地、市、县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织了3395人参加的文物普查队伍，举办了不同类型的文物知识展览，编印了各种宣传文件、讲稿和资料，及时出版了各级文物普查简报和通讯，投入了数百万元的经费。为提高领导和文物普查队伍的政策水平和专业水平，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省、地(市)和部分县，多次举办了文物普查、考古发掘、古建筑知识、测绘制图和文物鉴定等训练班，请有关专家、学者和领导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东历史、考古和民族、民俗、华侨文物基础知识，传授文物调查和考古技术，培养了大量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为我省文物普查工作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物普查工作的艰苦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工作在第一线的普查队员们，在烈日的烘烤下，在寒风暴雨中，背负行李、工具和资料，寄居农舍，饥餐荒野，忍受着蚊虫的叮咬，毒蛇的侵袭，走村串户，翻山越岭，跨河渡水，深入险洞，认真地宣传文物政策法规，细致地调查文物古迹，探寻地下遗存，详尽地测绘记录和精心地采集标本，为按时保质完成全省的文物普查任务，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宝贵贡献。1985年，文化部文物局和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普查工作中的先进市、县和模范人物，给予了表彰和奖励。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劳动，文物普查结出了累累硕果。根据各市、地上报的数字统计，全省共征集历史文物57697件、革命文物6113件；重新登记和发现古遗址2842处、古墓葬2804处、古建筑7195处、革命遗址1211处、民族、民俗、华侨等其他文物点、外国人在华文物、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证点等2918处。

文物普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主要应通过编写文物志、文物分布地图集来反映，就其重要成果和文物精华介绍来说，主要应通过科学研究论著和文物图录来反映。这本图录是在全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的基础上编辑的，虽不能全面反映普查的成果，但可以小见大，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分科学调查征集的宝贵实物资料。睹物思人念事，值此普查文物图录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支持这次文物大普查工作的领导和为文物普查工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文博工作者、普查队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恒彬

一九八九年春节

考古新发现和重要收获

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1982年初开始的全省范围的文物普查工作，迄今为止战果显著。可以说普查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学术调查研究工作。在调查中，不少市、县有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查明了新的文物点，从而填补了文物考古编年的缺环和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地域分布上的空白。这些新的发现和成果，可归纳以下几点：一、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从“区系类型”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境内考古学诸文化的内涵、特征、序列及与周围邻省古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二、粤东“浮滨类型”文化遗存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并发现了新的分布点；三、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分布及其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四、发现了广州地区以外的南越国时期的建筑遗址和墓葬群；五、首次发现唐代龙窑和仿越窑的瓷器；六、梅县瑶上宋代窑址出土的仿北方定窑瓷和海康县纪家镇公益村、杨家镇的宋——元彩瓷窑的发现和发掘，为广东陶瓷发展史，增添了光彩的一页；七、雷州半岛遂溪县附城边湾村窖藏出土的波斯银币，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史的新资料。

—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有曲江县枫湾镇骑马石大肚岩，龙归镇石背岩洞穴遗址，出土的砾石打制石器。该石器两端有打击石片疤（图版 1，2）。

众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这次文物普查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北从仁化县、始兴县，南至雷州半岛的吴川县、遂溪县，东部的潮汕平原，中部珠江三角洲，西部的西江中游的封开县，下游的高要县等地，迄今已发现了五六百处。从新发现的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观察，有石灰岩地区的洞穴遗址；河流两岸的山岗遗址、台地遗址；河谷和三角洲冲积平原上的贝丘遗址；海滨，岛屿上的沙岸（沙丘）遗址等。遗址数量比前期增加，分布范围扩大，文化层堆积厚，遗迹和遗物丰富。初步确定区域为四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及其海滨和岛屿；粤东区；粤北区；雷州半岛^{①②③}。根据文物普查所提供的线索，近年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珠江三角洲地区及海滨、岛屿已经发掘，列为新石器晚期前段^④的，有高要县广利镇蚬壳洲贝丘遗址，珠海市淇澳岛后沙湾遗址下层，深圳市大黄沙遗址第二文化层。出土了以夹砂细绳纹陶釜，和彩陶圈足盘及磨光石斧、石锛共存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广东境内拥有彩陶的遗址，目前发现不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和海滨沙岸遗址中出土，所见彩陶器形为泥质圈足盘，形制特点是侈口或敛口钵形浅盘，下加镂孔矮圈足。常见器身饰一层白陶衣，再在白陶衣上绘赭红彩，纹饰由带纹，波浪纹，点纹，圆圈纹等构成，盘的外壁和圈足表里均施彩。彩陶圈足盘是该地区这一时期的典型器。

1986年、1987年在高要县广利蚬壳洲清理了廿四座墓葬，葬俗独特，流行侧身屈肢葬，躯体蜷曲特甚，可能是死者经捆绑后埋葬的，其中一座是屈肢蹲葬。这类文化遗存的分布从珠江三角洲顶端到海滨和珠江口的岛屿，是研究岭南地区西江流域这一时期的

葬俗及氏族部落的迁移、分布的新的突破^⑤。更多的古遗址是位于海滨和岛屿海湾附近，距今约四千年的沙岸遗址。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很有特色，位于伸进陆地呈弧形状的海湾沙岸或沙堤上，高出海平面4~9米，大潮淹没不到的地方。湾内浪静风弱，背后和两侧有低山作屏障，一条发源于远山或低岗的淡水河流经遗址附近注入海中。若是沙堤遗址，在背海处是一片低洼的农田或沼泽，当时是一片与海相通的泻湖。1984年、1985年，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沙堤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使我们对海滨和岛屿上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文化面貌有了新的认识^⑥。遗址在岛东南方的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条形沙堤上，背海处为原是泻湖的农田，环农田三面均为低山，发源于山麓的淡水河流经遗址西北部入海。文化层堆积厚度为0.2~1.3米，包括新石器和宋代两个时期。前者堆积的底部可见炊煮时用的灶和灶坑，灶坑为平地堆砌，排列密集，无特定形状，有的用两面扁平的石块两排，竖排成长条形灶坑，坑底涂抹一层2~4厘米的粘土，也有用大块粘土同河卵石迭砌而成。涂抹的粘土已成为坚硬的红烧土块。出土了大量夹砂陶釜残片，占陶器总数的95%以上，陶釜器体大型，口径15~30厘米，器胎厚重，形制多数为敞口、宽沿外折，并有轮制时作成的凸棱和遗留的平行纹，扁鼓腹，圜底。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实心的小平顶大平底的夹砂陶支脚、器座和长方形镂孔陶簋。陶器花纹以粗绳纹、交错绳纹占多数，并有少量的器表拍印规整的几何纹泥质圈足罐、凹底罐、素面磨光圈足盘等，同佛山澜石河宕遗址上层、高要茅岗遗址的泥质陶罐、盘的形制特点基本一致，但陶器组合有很大差别。同类遗址在中山市兰田、张家边，新会县梅阁，珠海市水冲、下栅、白沙坑、沙煲地，深圳市南头赤湾，养殖场，蛇口后海等地也有发现（图版10、11、12）。

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七十年代发掘了南海县大同灶岗，佛山河宕贝丘遗址，八十年代又发掘了南海县鲛鱼岗、螺岗遗址。其中以1985年鲛鱼岗贝丘遗址的发掘较为重要。遗址为一处高出四周农田7.9米的低岗。文化层中包括有大量的淡水贝和少量海贝，分三个层次，清理了36座墓，儿童和少年的死亡率较高，15例成年人中有五例拔除上颌双侧门齿或上颌第一前臼齿。多数墓中无随葬品，有的置一件陶纺轮或石镞于上肢附近，或宽带形骨臂环佩戴在左手腕上，或骨梳和獠牙束发器置死者枕部。少数墓随葬1~2件陶器，组合是釜盘各一，或仅一件盘或釜。出土数量最多的是陶器残片，器类有夹砂陶釜，罐，器座，泥质陶罐，盘，豆等。其中以圜底器，圈足器为主，三足器、平底器罕见。几何拍印纹发达，纹样多达14种以上。出土的石器中近三分之一是用西樵山所产的燧石、霏细岩等石料制成，遗址东南距西樵山石器制作地7千米，从而进一步证明西樵山遗址是周围古代居民采石，制作石器的场所。

粤东区包括东北部山地丘陵及其谷地平原，山间盆地和韩江，榕江中上游，三角洲及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不少位于相对高度20~70米，少数遗址在高达150米以上的山坡或山顶上。韩江三角洲和沿海低地，有少数的贝丘和沙堤（本地称沙垄）遗址，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是这时期该地区古文化的特点之一。1982年发掘的普宁县广太镇虎头埔窑址是广东境内至今唯一保存较好的烧造几何印纹陶器的窑群，共十五座^⑦。窑炉建在岗顶，顺南坡挖成半地穴式。窑室内堆积大量红烧土块和几何印纹陶片。窑室的结构可分三类：长方形和圆角方形竖穴窑；圆形竖穴窑，后壁有烟道；平面呈“8”字形的横穴平焰式窑。“8”字形窑炉可分为窑室、火膛、火道三个部分。利用山

坡斜度,使窑内自然形成抽力,烧窑时火焰由火膛经长条形斜坡式火道通向窑室。窑室中部为高20~42厘米的放置陶坯的土台。土台周围是18~40厘米的环形火道,使陶坯得到温度均匀的焙烧,火候亦高,所以窑内出土的陶器多是青灰色硬陶,而前两类窑的烧法是下面堆放燃料,上面放陶坯,窑顶为拱形,通风差,火候较低,陶器多为橙黄色软陶。出土的陶器仅陶罐一类,有敞口高领和敞口折沿,多数为斜肩或圆肩,圆鼓腹,矮圈足。陶器上拍印的花纹,可以说是集粤东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何印纹纹样之大成,多达八类十几种,有条纹,间断条纹,长方格纹,曲折纹,圆圈纹,圈线纹,叶脉纹,编织纹及各类纹样的变形花纹,组合纹等。揭阳县埔田宝山岭遗址的发掘,除出土几何印纹陶罐之外,还有夹沙釜鼎,子口折腹鼎和镂孔圈足盘残片,上述陶器与粤北石峡文化遗存同类器形相近似,并见一件江西省同期遗址中常见的丁字形鼎足。可能距今四千年前,宝山岭的古代居民同北江中游和赣江流域的氏族部落早已有文化交往。普宁县池尾后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以鸡形壶(尊)、方格纹陶罐与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的文化遗存。形制独特的鸡形壶(图版 18),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尖唇,高领,用手捏合罐口沿中部而成壶口,前端口大,后端口小,头尾之间附宽带状把手,器底内凹,通体拍印方格纹。这时期陶器上的几何印纹纹样种类锐减,而方格纹发达。方格纹陶罐形制特征同浮滨类型文化遗存出土的有相似之处(图版 17),如高领外折,凹底,口沿穿对称双孔。但这类遗址没有出土陶大口尊、釉陶器和原始型大石戈。鸡形壶在揭阳县曲溪五堆、埔田岭后岭,和平县子顶山均有出土。可能是晚于虎头埔、宝山岭而早于浮滨类型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约三千五百年,假如这一论点可以成立,粤东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至商代晚期(相当于中原地区而言)的文化序列,已有一个粗略的轮廓。

粤北区在七十年代,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曲江县马坝石峡遗址,其中第三文化层堆积和墓葬中出土了前所未见的丰富多彩的遗物,区别于其他省区同期考古学文化,故定名“石峡文化”。在文物普查中,石峡文化的遗存又有新的发现。1988年初发掘的曲江县乌石床板岭遗址,清理了13座墓葬,埋葬习俗同样流行用火烧烤墓坑和二次葬,并首次发现了一座墓坑未用火烧烤,而采用大小河卵石和碎石铺垫墓底的作法。3号墓是墓葬中最大型的墓,除陶器外,还出土了石璧、石琮、石臂环、锥形器、石钺等(图版 21、22)。多数是石峡文化三期、四期墓中常见的陶器组合,但也有石峡遗址不曾见到的陶器。从随葬品分析,男女分工明确,墓葬中随葬陶纺轮的,不见石铤,而出石铤的则有数量较多的铤、铲、钺等随葬。在北江支流翁江上游翁源县坝仔下角垄遗址和东江上游与江西省接壤的连平县元善镇黄潭寺遗址,也发现了石峡文化遗存。

位于西江中游的封开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杏花镇鹿尾村和罗沙岗发现了石峡文化遗存墓葬^⑥,随葬品与石峡文化第三期墓葬的同类器物形制接近。鹿尾村1号墓出土了高身石琮,石臂环(图版 23、24)。这是不是反映了石峡文化的居民已有部分向西迁移呢?值得研究。

海康,徐闻县新发现的古遗址,是通体磨光的有肩、长身石铤、石斧和夹砂红陶、红褐陶罐共存,显然,它与海南省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未作过正式考古发掘,其年代和谱系,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至于中国新石器晚期后段,广东境内是否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就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证据尚不足。

中国的青铜时代，以其辉煌灿烂、独特的文化著称于世，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商代文化，疆域辽阔，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已越过长江到达鄂东·鄂南，湘东北，赣江，鄱阳湖流域，推想它们可能是当时方国的遗存。所以诸省的商代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尤其是铜器和陶器特点，有较浓的商文化作风，但又不尽一致，不少陶器和原始瓷器有其鲜明个性，这些又是本地土著文化的反映，如江西省的吴城文化。商代文化有没有继续南下，沿着赣，湘和粤之间的河谷山隘，翻过五岭，到达广东境内呢？这一直是广东考古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即广东青铜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特征、年代序列等。经过了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和近几年的文物普查工作，暂时还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商代文化已到达岭南，但相当于这时期的文化遗存是存在的。比较重要的是分布在粤东，闽西南地区的浮滨类型文化遗存^{④⑤}，以早期青铜戈，宽援石戈，大型长身石铤和器身拍印条纹的大口高领尊，釉陶尊、壶、豆、鉢等器物组合为特征(图版 25、32、34、36、39)。这次文物普查中，相继在揭阳，潮州，潮阳，丰顺，大埔，普宁等地发现了同类的遗存和墓葬群。迄今对“浮滨类型”文化遗存所作的发掘工作，主要是清理墓葬。揭阳县地都油柑山清理的八座墓中^⑥，出土了大口高领小平底的陶尊，而不见釉陶豆，壶，鉢及石矛，石戈等。陶器以夹砂陶为多，釉陶器少见，多数陶器是烧成温度不高的，形制为敞口，部分口沿有穿孔，宽肩或折肩，凹底或圈底的夹砂罐和泥质罐，器身拍印方格纹。其特点与粤东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罐有相似之处。可能属于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早期阶段。此外在珠海市水冲，南海县大沥出土了敞口，高领，折肩，深腹，矮圈足，器身拍印席纹，曲折纹的大陶尊。珠海市淇澳岛婆湾沙岸上采集到一件残圈足釉陶壶，是研究珠江三角洲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线索。

有关这类文化遗址的年代，因为未发掘过典型的遗址，所以分歧较大：(1)认为是与夔纹陶类型文化并存的，年代为西周至春秋^⑦。(2)认为由于商代文化南下的影响，年代定在商代。(3)认为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前期。因此，图录中这部分文物定在商周时期。

西周的青铜器历来在广东发现不多，七十年代曾在信宜县松香厂出土了龙纹青铜盃^⑧。近年来在佛岗县石角科旺大庙峡和曲江县马坝镇马鞍山南麓出土了云雷纹青铜铙(图版 43、44)，都是单独出于山腰和山麓，无其他遗物共存，可能是当时祭祀山川的遗物，形制均为短角中空与铙体相通，主纹是云雷纹，其次是“C”纹，器体厚重，同湖南出土的同期铜铙形制和花纹近似，相当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址、墓葬及遗物，在和平县、珠海市、深圳市、博罗县、惠东县、惠来县、海丰县、揭阳县、乐昌县、封开县、梅县均有发现。近年来出土的几件青铜戈，应是越式器，如惠东县安墩发现的青铜戈，援和胡部通体铸勾连云雷纹。乐昌县对面山出土的一件青铜戈，援、胡部铸夔纹。还有深圳市大梅沙出土的铜戈(图版 45)^⑨，都有别于中原地区同期青铜戈的形制，无疑是本地铸造的兵器。春秋时期的墓葬，

1983年至1984年，在封开县杏花镇牛围山，曾发现了七件夔纹、勾连云雷纹、方格纹的大型陶瓮，瓮内器底土中含呈白色的骨殖碎块，上部置一件青铜斧，很大的可能是二次葬中的瓮棺葬。较重要的发现是在北面与江西省毗邻的和平县城郊龙子山东坡，1986年发掘的一座春秋晚期的墓，为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有从大到小的玉珪10件，宽援、短胡有两穿的青铜戈1件，青铜钺1件和2件青铜刮刀，1件青铜鼎，原始瓷豆4件，方格纹双耳圈底罐（硬陶）、陶盃各1件。这种随葬器物组合的墓葬，为广东首见。用复合范铸成的青铜鼎，胎薄且质地疏松，有许多气孔，器表有圈带纹，三角雷纹，但纹样漫漶，不太清晰，器底因破碎曾焊接修补过。柱形足的内侧有凹槽，足根部残留有内范的泥块，很显然这件鼎不是楚式器，而是越地铸的鼎。稍晚的1987年在乐昌对面山清理的春秋战国之际的四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均发现有圆形腰坑，坑中置一件饰夔纹或勾连云雷纹的大陶瓮或陶缶。博罗县公庄镇陂头散屋村出土春秋时期七件角钟^⑤，其中六件大小相递，角部中空，干旋齐备，舞、篆、鼓部饰勾连云雷纹、三角云雷纹、变体蟬纹等（图版51~57），无其他共存物，应属窖藏遗物。另外，位于雷州半岛的海康县，首次发现了夔纹陶罐。

战国时期岭南是百越聚居之地，始兴县，乐昌县，和平县，揭阳县，深圳市，珠海市，封开县，潮州市都发现了以米字纹、方格交叉纹、回字交叉纹、篦点纹、水波纹陶器为主要特征的遗址和墓葬。在罗定县背夫山^⑥，乐昌县对面山、始兴早头岭2号墓^⑦，发掘了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品的墓葬，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墓底有腰坑，埋一件米字纹或云雷纹的大陶瓮。乐昌对面山战国时期二十多座墓，多数有二层台，但无腰坑。随葬的青铜器以兵器为主，有剑，矛，戈，匕首，镞，刮刀，削，斧等。而罗定县背夫山1号墓出土的青铜器有98件，其中三叶矛，叉，锯，镰，为广东首次发现（图版61、62）。两件青铜鉴，器身饰蟠虺纹或蟠螭纹，花纹细密规整（图版59、60）。战国墓出土的铜鼎，多数形制为盘口鼎，折沿鼎，三足外撇，器胎单薄的越式鼎。背夫山1号墓随葬如此丰富的青铜器，原始瓷器，陶器，玉器，石器，反映了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有地位的贵族。文物普查中在和平县城郊龙子山、子顶山、下陈山的山坡和山顶，发现了暴露在地表的米字纹或方格纹陶瓮、釉陶甗、敛口三足盒、陶鉢、陶杯等，器物保存完整，经分析这些陶器原来是墓中随葬品，被近代破坏所致。在和平县大坝镇社径山的山坡，见到了几件米字纹的大陶瓮，上置大陶鉢为盖，侧身埋在地下，瓮内无随葬品，应是这时期二次葬中平民百姓的瓮棺葬。另一重要发现是在兴宁县新墟鬼树窝崩岗的窖藏^⑧，出土了大小相递的青铜编钟6件，钲部背面无纹，正面有棱形纹，三角形纹，勾连云雷纹，在纹饰不清晰的部分，用利器鑿凿斜线纹作填充，铸造技法粗糙（图版72~77）。

三

秦汉时期的广东，是政治、经济、文化进入大发展的时期。西汉初，南越国统治时期的中心是广州地区，1983年在广州市象岗山发掘了举世瞩目的南越国文帝赵昧墓。是